

十年来社会组织(NGOs)参与防治艾滋病研究述评

张宁,武沐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

摘要 随着防艾实践的深入,中国政府借鉴国际防艾先进经验并根据国内艾病传播流行趋势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重视社会力量参与防艾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防艾工作取得长期效果的保证之一,在社会力量参与防艾实践中社会组织(NGOs)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且成效显著。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给予了高度关注,学人们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本文对学界近十年来这方面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回顾,在总结述评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研究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 社会组织 防治 艾滋病 述评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1)02-0053-06

一、引言

根据2010年11月29日卫生部的通报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0393例,其中病人132440例;死亡68315例。2009年,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结果表明:截至2009年底,估计我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其中病人约10.5万人,2009年新发感染者约4.8万人,因艾滋病相关死亡约2.6万人。”^[1]艾滋病问题既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现实社会问题,艾滋病流行迅速、病死率高、对经济社会的破坏性大,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温家宝总理指出“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保护世界,保护人类,保护自己。”高层领导对防治艾病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防艾工作的取得长效均提出了要重视和动员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NGOs)在艾病防治中具有灵活性、独立性、大众性和公益性等特点并在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是社会力量参与防艾典型代表,是国家防艾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和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NGO)在参与防控艾滋病中有其独特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各国均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2004年,中国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机制。又先后制定了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和两个五年行动计划,2006年又出台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皆提倡鼓励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此外我国参与的一些重要和大型国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对社会组织(NGO)参与防治艾滋病提供专门经费资助,有利于促进本土社会组织防艾积极性和相关能力提高。近些年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广泛回应^①,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为了解和重视社会组织(NGOs)在艾病防治领域的作用与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以社会资本、社会文化、社会支持、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控制、社会网络等理论视角为研究抓手,侧重对近十年来学界关于社会组织(NGOs)参与防治艾滋病问题进行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组织(NGOs)参与防艾研究的可能方向。

收稿日期 2010-12-09

作者简介 张宁(1982-),男,江苏溧阳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二、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梳理与回顾

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研究方法多以文献资料法辅以一定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模式;研究的社会组织囊括了各类型组织,包括:国外非政府组织、国内的民间组织、草根组织(如男性接触者组织、女性性工作者组织、感染者/患者互助组织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宗教组织。研究阶段以2000年为界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第一阶段以1993年11月30日成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为起点到2000年3月在珠海召开第二届非政府组织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通过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共同行动准则》为标志,集中在医学(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流行病学)领域讨论研究非政府组织(NGO)参与防艾问题;第二阶段以2001年11月“中国第一届性病艾滋病大会”召开以及随后召开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和2003年的“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为标志,社会科学开始涉及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对社会组织(NGO)的研究。通过对近十年的研究文献梳理,社会组织(NGO)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研究,大致涉及到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即:社会资本、社会文化、社会支持、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控制、社会网络,下面将逐一进行回顾。

1.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孙雪慧等^[2]认为“防治艾滋病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良性及恶性互动,结合中国国情,探讨如何通过良性互动促进艾滋病防治中社会资本的增值以及不同的互动方式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影响。”李丹丹通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一个男同性恋工作组——G工作组的调查,提出“获取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社会资本的思路包括建立信任关系网络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基础;有效开发和管理志愿者的社会资本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支撑;调整管理体制和加强法制建设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制度保障;积极培育公共精神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文化基础。”^[3]李光勇^[4]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一源自凉山彝族本土、扎根本土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调查得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对提升凉山彝族地区社会资本存量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构建社会网络;一是培

育公民信任;三是重建社区规范。

2.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中央民族大学侯远高教授和张海洋教授合作对弱势群体调研时发现,毒品和艾滋病给彝族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随即展开对该地区艾滋病问题的田野调查和研究,研究的最重要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本土社会组织(NGO)充分调动民族文化资源发挥自助优势开展防艾禁毒关怀等一系列行动。^[5]在众多本土学者和社会名人的帮助下,于2005年成立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6]。发展中心在毒品、艾滋病预防和妇女儿童关怀方面做出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彝族地区要积极利用民族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努力改变现状,政府和民间携手共进。”^[7]兰林友教授与四川P市基层民间组织(向日葵小组)合作对T社区女性性工作者群体进行了全方位观察与研究^②,认为“通过对小姐群体性实践的行为数据品质的比较研究,验证小姐所说、实际所做的性行为,从而发现对于公共卫生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文化行为的细节,为艾滋病行为干预提供地方性意见。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而言,尽管大多数小姐都知道,但对艾滋病的危害程度和与自身的关联,基本上缺少深刻的认识,更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这就是说,并无实质性的高危行为改变。”^[8]对有商业性行为的女性组织研究,以“作为组织的文化特征”为视角为近几年较为引人关注的研究动向。庄孔韶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有商业性行为女性人群组织一系列研究^③,讨论将“小姐”群体流动方式看作是“做为文化的组织”加以考察,从中发现“小姐”群体背后存在的地缘、业缘、亲缘等关系,有利于向卫生疾控等相关部门建议提供更加有效地干预措施,也找到了学科应用性价值的契合点。富晓星和吴振以“主位”视角同性恋草根组织志愿者身份深入沈阳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生活中参与观察^[9],探讨了异性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实践如何在城市空间“点儿”中得以组织、表达和理解。并发现通过与同性恋群体自身特点的互相作用,城市空间“点儿”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了能动平台。

3.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向德平教授与程玲博士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调查了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组的发展状况,总结了自助小组的作用,分析自助小组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认为“提高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既需要社会

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的努力。自助小组是艾滋病感染者消除社会歧视、提升个人能力、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10]程玲博士通过对湖北省7个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相关增权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认为“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的发展是小组成员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是有益于艾滋病患者个人成长的。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以结构为要素,通过小组活动中成员间的互动,帮助艾滋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和发展社会潜能,促成艾滋病患者的改善和艾滋病患者互助组织的发展。”^[11]

4. 社会工作理论视角。刘春湘和古力努尔·达吾提汗^[12]的论文通过NPO积极参与防艾公益活动的作用分析认为,NPO起到了减少羞耻,消除歧视,满足艾滋病病人爱与归属的需要,推动社会公益、实现公平的作用。梁德红、李坚通过对沈阳地区一个主要面向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服务的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论证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健康教育的有益作用,并结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等相关理论,提出可行性建议。”^[13]向德平、李光勇^[14]提出在欧美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均受聘于各类非政府组织,政府或地区行政机构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非政府组织再派出社会工作者到社区开展工作。因此,政府应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让非政府组织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就业岗位,保护其合法权益、创造良好工作环境,进而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

5. 社会治理理论视角。王彦斌和余翠娥^[15]的文章认为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至今的20余年里,中国社会各界对之从不敢、不愿承认到全面综合的干预性防范,艾滋应对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是社会对艾滋病的综合干预覆盖面过窄和人们对艾滋病相关患者的社会歧视严重。有效的艾滋应对,应从三个方面展开:在结构层面,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沟通与互动机制,扩大艾滋应对的整体覆盖面;在个人层面,促进社会成员方便获得艾滋预防的知识和信息,避免高危行为的发生,并探讨消减社会歧视方法与途径;最终,以社区和民间组织作为连结结构层面的措施和行为干预层面措施的落脚点,促进艾滋应对的具体落实。许文慧^[16]的研究论文选择我国艾滋病的重灾区,同时也就我国NGO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云南省,在实地调查、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云南省NGO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现状、特点及所面临问题。论文对成功遏制艾滋病传播地区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梳理,分别从政府和NGO自身的角度分别提出建议,以期促进我国NGO更好的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之中,使我国能更加有力的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杨芳博士^[17]在其研究论文中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多元社会治理架构进行分析,然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重大传染病控制领域非政府组织基本现状、重大传染病领域非政府组织能力状况、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提出自己对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设想与思考。罗娟^[18]通过在凉山州对国际和国内NGO的田野调查,认为“NGO在凉山的兴起既非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也非是当地社会“市民化”的产物,而是国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诉求有效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与全球化、民主参与政治理念扩张渗透之间的一种合谋。”

6. 社会控制理论视角。周向红博士^[19]提出“由于艾滋病流行在我国已进入增长期,如何有效控制艾滋病毒在吸毒者、同性恋等高危人群中蔓延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仅涉及政策设计和科学性,也取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和设计。在具体防治艾滋病流行过程中,各项具体措施一方面受到各地文化习俗、经济状况、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政府等主体角色的限制。因此在强调政府的作用的同时,应鼓励非营利组织、企业的共同参与,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政策执行模式,以确保艾滋病防治取得胜利。”韩俊魁博士^[20]指出,由于政府资源很少向艾滋病防治领域的非政府组织(NGO)开放。这不仅不利于防治艾滋病蔓延,也不利于培育公信力较高的本土NGO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或在政府无暇顾及的领域发挥功能性补充作用。其论文在分析了NGO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必要性、三类NGO主体的不同特点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防治艾滋病领域的NGO购买服务的原则和设想。余惠芬^[21]从云南省艾滋病流行的严峻性、防治需要与资源缺乏的矛盾,目前多项目的投入、交叉和重叠、非政府项目与政府协调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协调工作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有利条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协调工作对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工作实践对如何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协调提出了积极建议。

7. 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王丽艳和吴尊友^[22]指出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间的关系共同构成的结构

模式,而艾滋病病毒正是遵循一种结构化的、非随机的模式传播。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来研究艾滋病病毒传播及其影响因素,将对全面理解艾滋病流行的模式、探索影响流行的因素以及利用高危人群形成的网络结构特点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有指导意义。陈萍^[23]在其论文中认为非政府组织由于具有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鲜明的行业、部门和地区色彩,加之艾滋病具有潜伏期长、爆发危害的滞后性、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所涉及的个人生活和心理因素的私密性等特点,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能够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

三、讨论与建议

1. 相关讨论

通过对近十年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关于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在2006年以来获得快速发展,不仅表现在研究论文的数量上,而目表现在研究论文的质量上。原因在于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防艾工作中对社会组织参与功能逐步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可。此外是2006年以来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防艾合作项目增加迅速,这些项目资金基本都要求有关各类型本土社会组织来直接承担,客观上就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的积极性。这些就为学人们观察和研究社会组织起到了很好的平台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与实践的联系,尝试在学术研究和防艾实践之间建立桥梁。综上所述,我们试对以上研究成果做一述评:

第一,研究深度整体不足,还需进一步挖掘加强。纵观以上理论视角,除社会文化、社会支持视角中学人们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对有关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外,其他几种理论视角的研究还是缺乏深入的、细致的、扎实的个案调查。典型性的个案和有深度、有新意的理论分析还不多见,这就影响了对社会组织在参与防艾实践中学术评论质量。

第二,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视野需引起注意。上述几种理论研究视角在运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对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课题。在研究中需要运用各学科的有关理论相互启发、指导,这样更有利于研究质量的提高。如在社会工作理论视角研究中,若考虑公共危机管理和全球治理等理论,可以将研究置于一个更全面的背景下进行论

述研究。

第三,在深入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逐步构建本土特色的中层理论的可能性。学人们在借鉴吸收西方相关理论的同时,也在一些领域探索总结研究的范式,比如庄孔韶教授提出“作为文化的组织”在研究商业性女性性工作者组织中预防艾滋病、性病时所起到的作用。在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中层理论的建构对当前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研究非常重要,为理论导向实践工作的成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四,宗教组织参与防艾功能与作用研究不够。在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研究中,运用相关理论视角对宗教组织关注度还显不够,宗教组织参与防艾深入研究还不多见^④。我国艾滋病流行的大部分区域多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新疆、云南、广西、四川等地,一些民族地区又都全民信教,宗教力量在该地区防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足够重视。

2. 若干研究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对今后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的研究方向提几点建议:

(1) 加强借鉴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积极拓展并构建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视角。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病是一项社会系统综合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深入研究时必须建立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框架,而不是单单运用一种理论或学科视角来审视。综合的研究视角框架有利于实现在社会组织防艾的研究中取得理论建构方向的突破。

(2) 细致、深入的各类型社会组织个案调查研究是以后研究的趋势特征。不论是本土的各种民间组织(草根组织)还是国外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宗教组织,对以上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的研究唯有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才能深刻认识各类组织参与艾病防治的利弊得失。

(3) 加强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利于彰显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价值。有学人指出“总的来说,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明显不足。”^[24]近年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问题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有所提高,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对指导防艾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学人们整体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意识还有待提高,比如主动与卫生疾控等部门的互动联系,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发表或提供相关实务机构等,这样就使得外界不

了解甚至不知道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防艾研究方面做了些什么,学科的价值和话语权没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来。

(4) 社会组织防艾研究的思维定位应以“是怎样”的具体、精致、客观性为方向导引,注重从各组织产生、运作、调适、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在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下,把社会组织的要素、结构关系呈现出来,把它的运作过程、运作环节展示出来,着重于实际过程和实践活动。以这样的研究思维开展研究工作可以更好的把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的实践真实客观的作为实实在在的个案反映出来,进而在总结归纳社会组织在防艾工作中的功能作用中起到认识作用,为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起到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 [1] 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EB].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 2010-11-29,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jbyfkzj/s3586/201011/49893.htm>
- [2] 孙雪慧等. 从互动的视角看社会资本和艾滋病的防治[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0, (6): 424-426.
- [3] 李丹丹. 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的社会资本状况研究——以 G 工作组为例[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4] 李光勇. 本土非政府组织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以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为例[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0, (2): 64-68.
- [5] 侯远高, 丁娥主编. 发展的代价: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伤害与艾滋病问题调研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6] 梁艳菊. 凉山: 一个本土化的 NGO: 记侯远高和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J]. 中国民族, 2009, (1): 4-8.
- [7] 曲比阿果, 陈雄飞.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凉山彝区出现的传染疾病及预防对策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7, (6): 203-207.
- [8] 兰林友. 性行为数据品质与艾滋病行为干预: 市 T 社区小姐群体性实践的个案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 83-93.
- [9] 富晓星, 吴振. 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 以沈阳为例[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10, (1): 38-52.
- [10] 向德平, 程玲. 自助小组的建立、运行及作用: 以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组为例[J]. 社会工作(学术版), 2007, (1) 下半月: 5-10.
- [11] 程玲. 互助与增权: 艾滋病患者自助小组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2] 刘春湘, 古力努尔·达吾提汗. 关于 NPO 扶助艾滋病人的作用分析[J]. 经营管理者, 2010, (1): 342-343.
- [13] 梁德红, 李坚. 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同性恋群体中健康干预初探——对沈阳市方舟健康干预志愿小组成长的思考[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6, (3): 271-273.
- [14] 向德平, 李光勇. 社会工作: 艾滋病患者救助实践的新路径[J]. 河南社会科学, 2010, (1): 125.
- [15] 王彦斌, 余翠娥. 政府与社会: 艾滋应对中的结构与行为层面衔接问题——来自云南德宏和保山实证分析的结论[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55-64.
- [16] 许文慧. 艾滋病防治领域的 NGO 参与问题研究——以云南省为例[D].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17] 杨芳. 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我国重大传染病控制的治理模式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18] 罗娟. 凉山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兼谈 NGO 本土化问题[D].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19] 周向红. 公私部门伙伴关系与政策执行模式转变——以艾滋病防治政策为例[J]. 理论探讨, 2005, (2): 93-97.
- [20] 韩俊魁. 论政府向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购买服务的几个问题[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8, (2): 162-164.
- [21] 余惠芬. 浅谈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J]. 卫生软科学, 2006, (5): 499-500.
- [22] 王丽艳, 吴尊友. 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应用[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0, (5): 456-459.
- [23] 陈萍. 艾滋病传播的社会网络分析[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24] 张晓虎. 国内艾滋病问题的研究现状评析[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4): 26-27, 35.

【注释】

- ①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 万延海: 《发挥非政府机构在艾滋病控制中的作用》, 《中国健康教育》, 1992 年第 11 期, 第 9-11 页; 井彩霞: 《中国参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草根非政府组织调研报告》, 《中国性科学》, 2005 年第 11 期, 第 8-17 页; 潘绥铭等: 《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1 期, 页 85-95; 何伟等: 《江西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现状调查分析》,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3 期, 第 1594-1595 页; 陈旭清: 《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状况分析》,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6 年第 6 期, 第 580-582 页;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 《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调研报告》,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 2006 年 12 月; 文亦桦: 《防治艾滋病, 非政府组织作用不可替代》, 《人权》, 2007 年 4 期, 第 53-54 页; 黄水群、罗玫: 《草根组织与艾滋病防治初探》,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7 年第 4 期, 第 363-364, 366 页; 王学工、马铁成: 《非营利组织在防治艾滋病中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7 年第 4 期, 第 398-399 页; 郭浩岩等: 《香港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启示》,

- 《中国艾滋病性病》,2008 年第 2 期,第 156-158 页;李慧等:《中国部分省份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组织状况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08 年第 3 期,第 246-248 页;刘昆仑:《中国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中国艾滋病性病》,2008 年第 5 期,第 531-533 页;杨芳等:《湖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现状分析》,《医学与社会》,2009 年第 4 期,第 8-9 页;戴光全、陈欣:《国际 NGO 在中国:艾滋病合作项目个案的社会人类学观察》,《社会科学家》,2009 年第 9 期,第 100-103 页;陈昭云等:《河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现状及问题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 年第 1 期,第 66-67 页;夏国美:《中国 NGO 的当代跨越》,《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第 50-56 页;韩俊魁:《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障碍及其解决:以云南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第 151-156 页;张金鹏:《云南跨境民族社会危机应对管理机制研究—基于边疆地区对艾滋病防控的社会调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59-63 页;徐莉:《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模式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91-97 页。
- ② 研究成果包括:兰林友:《小姐群体特征与艾滋病防治:趋势挑战及对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兰林友:《脏的文化建构》,《读书》,2010 年第 8 期;兰林友:《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安全套使用意愿的人群分类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 年第 4 期;兰林友:《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女性工作者艾滋病防治知识的 KAP 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 ③ 包括:庄孔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李飞、庄孔韶:《“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刘谦、吴庆戎:《从组织文化特征出发的低交易价格性产业艾滋病防治策略以——Lz 市“板板茶”为例》,《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 年第 1 期;郭丽香:《“小姐们”的组织与流动——对四川省 Y 县性工作者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5 月。
- ④ 关于宗教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的探讨已经兴起,《中国民族报》曾刊登过一些文章讨论相关问题。包括:《伊犁州直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的方法途径》,2010 年 9 月 14 日第 6 版;《西双版纳有个“佛光之家”》,2009 年 12 月 1 日第 5 版;《宗教对艾滋病防治的关注》,2009 年 12 月 1 日第 6 版;《重建有“神”的社区》,2007 年 3 月 23 日第 6 版。